

他们随侵华日军践踏中国土地,宣扬对中国人民的仇恨 粉饰日军暴行的“兵队作家”

□ 时培京 文/图

栋田博:《分队长的手记》

日军用汉语向当地百姓搭讪,表面上说“您好”“谢谢”,心里却想着:中国的老百姓,统统杀掉。

看,这就是“兵队作家”所谓的纪实

《分队长的手记》是栋田博的代表作,由《急赴前线》、《马腰坞的战斗》、《敢死队出发》、《黄河敌前渡河》、《突入济南城》、《城墙的下士哨》、《出发前夜》、《夜袭》等多章组成。整篇手记大都是当时纪实录,也写到了军队的日常生活情景、士兵的心理状态。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出现的篇幅较大、影响较大的“军队文学”作品之一。他在书中写道:“我又想,不光是我,很多的战友,每次战斗时,都气得破口大骂。但是,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的人啊!战斗结束后,就把这种事忘到脑后,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姓,‘快快的’、‘慢慢的’、‘您好’,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。他们给茶喝,就一个劲儿地说‘谢谢’;要是有孩子,就说‘小孩,过来过来’,老想给他们点东西。然而现在我真想再也忘掉这些,还是那句话:‘中国的老百姓,统统杀掉!’”

火野苇平:《麦与士兵》

把侵略战争与残杀中国军民描写得如此诗意,把侵华战场说成是可以实现英雄梦想的“神圣之地”。

瞧,这就是日本“国民英雄”把侵略说成“圣战”的文学

“敌方确实顽强,枪声始终不绝。一抹黄色的半轮圆月,浮现在半空之中。水国里不绝地传出蛙声。在战场上听见蛙声,分外觉得寂寞……”这是火野苇平的小说《麦与士兵》描写的场景。

火野苇平所创作的以徐州会战为背景的《麦与士兵》是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所诞生的,它带动了日本战争文学创作的又一次高潮。具体分析火野早期的思想状况,其本身就存在着缺陷,而其从军经历又将其战争观定格在“自我”的框架中,对其后期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在创作体验时的特殊二重身份,决定了作品的整体基调,造成了作品在视角选择上的“单向”与“狭隘”。(见周朝伟《日本从军作家火野苇平及其战争文学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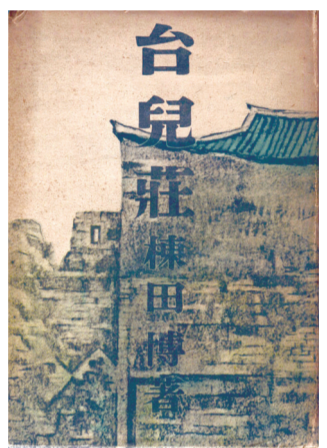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《分队长的手记》有人评论:“对于‘战争’、‘作战’的来龙去脉不作辨析,从士兵的立场上也不能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战争。作为一个日本士兵,在那生命轻于鸿毛、困苦无可言喻、实况无比悲惨中,士兵们只管战斗、只管勇往直前地行进。他只是贴近士兵,最充分地描写了这些士兵的情绪和状态。所以,可以说,从了解战场上士兵的真实立场和情绪这一点上看,《分队长的手记》比《麦与士兵》或《花与士兵》还要优秀,还要令人感动。”

1942年,栋田博发表以台儿庄战役为题材的纪实小说《台儿庄》。因《台儿庄》书中有火化日军阵亡者的场景描写,并透露了对华作战初期日军在台儿庄战败的消息,被认为有影响社会治安之嫌,因而予以查禁。栋田博多次赴中国和东南亚前线进行从军



采访,不断写作并发表以战争为题材的所谓“军队小说”的写作。

“兵队作家”作品写到了日本侵略者在台儿庄失败、沮丧。七十多年后,蒋介石之孙蒋孝严再接受《台儿庄一九三八》剧组采访时说:日军在四月初,四月六七号的时候夹着尾巴逃了嘛,这个手枪我们就获缴1万多支啊,坦克有40多辆啊,装甲车有70多辆啊,那这是什么,你没打败你会留下来?让我做展览用?



日本的侵华文学,主要有两部分作者。一部分人是受报纸杂志社派遣的职业作家,如所谓“笔部队”的成员。他们没有实际的作战经历,在战场上他们至多是“观战”,而不是“参战”,因此,他们写的,要么是“从军记”之类的东西,要么是“观战记”之类的东西。另一部分人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,即所谓“兵队作家”。他们当中,有的原来就是作家,或有一定的写作经验,后来入伍从戎,如火野苇平、上田广等。这一部分人为数不多。更多的是以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的战场上的官兵。评论者也称为“外行作家”。《分队长的手记》的作者栋田博属“外行作家”。他们都是为着美化侵略,宣扬“圣战”服务。踏上中国国土的侵略者,宣扬的是对“自己人”的“人情味”、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疯狂,以及对日本兽行的弱化和粉饰。

徐州会战期间的日本“兵队作家”主要有火野苇平、栋田博、山口季信等。栋田博于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应征入伍,其处女作《分队长的手记》写有“作者的战历”:他作为赤柴联队的上等兵(分队长),随侵华日军自塘沽登陆,经天津,由油河镇、静海县、马场、沧州,侵略山东,后在侵略台儿庄时被炸伤回国,结束了他在中国土地上的侵略行径。

民。这是一本了解日本人的必读之书。”

《麦与士兵》一炮走红,使火野苇平一跃成为“战争文学第一人”。此后,又创作了《花与士兵》、《土与士兵》,连同《麦与士兵》被称为《士兵三部曲》,发行量达到300万册。《士兵三部曲》还很快有了两种中译本,在沦陷的北平、上海以及伪满政权中心长春公开发行。1939年12月,回到日本火野苇平,被奉为“国民英雄”,《士兵三部曲》获朝日新闻文化奖、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。他四处演讲,而很多受到他影响的日本青年,自愿投入侵华战场——那个可以实现英雄梦想的“神圣之地”。

另外还有陆军步兵军曹山口季信著,并于1939年6月25日出版的、福荣真作序的《火线出征——台儿庄激战记》等。

枣庄籍的黄埔人

□ 王功彬

据笔者多年的搜集整理,枣庄(峄县、滕县)籍黄埔军校学生共203人,其中市中区籍(舍居住在中区的外籍黄埔学生)共19人,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抗日战争。在抗日战场上,市中黄埔人不计生死,战功卓著,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杀敌骑士——吴本生

吴本生(1916年—2004年),据吴本生之子吴景辉先生介绍,吴家祖籍临沂平邑,祖父初至齐村为崔翰林家族看管林地。吴本生小时家贫,后经其姐夫介绍,入枣庄中兴公司小学上学,又跟枣庄武师朱柏霖练武。后考入临沂师范,毕业后到西集教学。抗战爆发后,吴本生不愿在家当亡国奴,便到武汉报考军校。黄埔军校毕业后,吴本生直接参加了抗战。

吴景辉说:父亲曾讲过,在

威海与日本人作战时,自己的部队配合其他兄弟部队,一次就俘虏了六百多日军骑兵。父亲的马术很好,他在俘虏的六百多匹马中,挑了一匹最好日本大洋马。父亲不仅马术好,拼刺水平也很高。1986年在枣庄拍摄《血战台儿庄》电影,影片里有战场拼刺的镜头,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拼刺教练,时任枣庄市委宣传部长石宝光听说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,又参加过抗日,就找到我父亲。就这样,我父亲教了一些武警战士(演员)三个月的“东洋刺”,练得很成功。

险中求生——钱秉确

钱秉确(1920年—2012年),在经历少时被土匪绑架的磨难以后,钱秉确经过勤奋刻苦的学习,最后以名列第十三名的成绩,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十七期一总队炮科。1942年4月军校毕业

后,钱秉确被分配到宝鸡特种兵联队炮科学生大队,任少尉区队副,并兼任炮兵观测课教师。一年后,他主动申请奔赴抗日前线,参加对日作战。

在抗战期间,钱秉确身经万险,每次都化险为夷。有次在战斗后部队转移时,他突发高烧,被迫留在百姓家养病,病愈后与日寇小股部队周旋了半个多月,才化装成百姓摆脱日军的搜查,终于找到了部队。

1945年4月在豫、鄂西战役中,钱秉确炮兵营在南阳卧龙岗附近以火力支援守城部队,激战四天后转移,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低空扫射,致钱秉确身旁的通信兵和三名战士壮烈牺牲,自己躲过一劫。

一炮获重奖——李鉴恩

李鉴恩(1916年—1996年),七七事变的枪炮声震碎了李鉴恩

的美梦,1937年农历十一月月中旬,报考了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炮科。

军校毕业后,李鉴恩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。关于这次战斗,李鉴恩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到:到达长沙后,我营赶忙设观测所,构筑掩体,耳畔是一片枪声。我从炮队镜看出去,也见不到一个日本鬼子,炮兵的任务是以振奋友军士气为主,只要有步兵的要求,我就大量的火力支援。在接火第三天,战况稍微沉寂,我到掩体外观察,就听到日本机枪“啪啪”的声音,在缩头的一瞬间,刚站立的观察所木梁上,就中了八颗子弹!我吓出了一身冷汗,马上指挥全营火力,打了不下千发炮弹。第四天,战况越发沉寂,起初以为日寇攻击顿挫,及至出来一看,才知道我军已经全线撤退,我们的猛烈射击,正掩护了退却。

